

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

《今日世界》的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

單德興 著



作者簡介

單德興

臺灣大學外文研究所博士（比較文學），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曾任歐美研究所所長、《歐美研究》季刊主編、國科會外文學門召集人、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曾獲第六屆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首獎、第三十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國科會外文學門傑出研究獎（三次）、第五十四屆教育部學術獎、政治大學一〇五學年度傑出校友、科技部一〇八年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著有評論集《銘刻與再現》、《反動與重演》、《翻譯與脈絡》、《越界與創新》、《薩依德在台灣》、《翻譯與評介》、《跨界思維與在地實踐》、《翻譯家余光中》、《訪談的技藝》；訪談集《對話與交流》、《與智者為伍》、《卻顧所來徑》、《擺渡人語》；譯作《寫實主義論》、《英美名作家訪談錄》、《近代美國理論》、《美國夢的挑戰》、《知識分子論》、《禪的智慧》、《格理弗遊記》、《權力、政治與文化》等。研究領域包括英美文學、比較文學、翻譯研究、文化研究。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本書獲得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目次

緒論：文化冷戰與冷戰文化	1
一、往事並不如煙，如何反思再現？	1
二、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	7
三、本書概要	13
四、結語：既一時一地又跨越時空	19
第一章 美國即世界？：	
《今日世界》的緣起緣滅	25
一、前言	25
二、宏觀篇：《今日世界》的緣起與特色	27
三、微觀篇：以狂飆的一九六八年為例	34
四、事過境遷：《今日世界》的緣滅	43
第二章 青青邊愁·鬱鬱文思：	
析論余光中的《今日世界》專欄散文	47
一、臨界香港	47
二、書寫香港《今日世界》專欄散文	52
三、從「詩餘」到詩文並重	60
四、特色與關懷	62
五、結語：一段豐美的插曲	87

第三章 冷戰・離散・文人：	
《今日世界》中的張愛玲	99
一、三訪因緣：張愛玲的香港時期	99
二、《今日世界》中的小說家張愛玲及《秧歌》	110
三、《今日世界》中有關張愛玲的評論	125
四、結語：以文字創作為家的離散文人	151
第四章 冷戰・文學・傳播：	
《今日世界》與美國文學在華文世界的傳播	171
一、《今日世界》的出現與目標	171
二、《今日世界》與美國文學的多元呈現	174
三、結語：潤物無聲的文化效應	217
結 論：從今日世界看《今日世界》	227
出處	235
後記	237
索引	243

第一章

美國即世界？： 《今日世界》的緣起緣滅

一、前言

人類歷史上規模最龐大、死傷最慘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於一九四五年結束。「熱戰」雖然告終，「冷戰」卻繼之而起，以美利堅合眾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與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而陷入長期的競爭與對抗局面，雙方無所不用其極，力求在這場戰爭中獲得最終的勝利。筆者在〈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一文中，對冷戰的背景有如下的簡要描述：

眾所周知，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蘇兩大政治與軍事霸權對抗的冷戰局勢逐漸成形，各自亟思擴大勢力，削弱對方，遂行己方的意識形態，捍衛自身的安全與利益。1947年，美國外交及戰略家肯楠（George F. Kennan）提出圍堵政策，主張作為自由世界領導者的美國應該結合理念相近、利害攸關的國家，在歐亞大陸邊緣構築戰線，圍堵蘇聯共產勢力的擴張。此一主張形成美蘇兩大陣營的對峙，主導了戰後數十年的國際局勢。對臺灣而言，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

門 (Harry Truman) 立即下令美國駐遠東地區的軍隊介入，派遣第七艦隊協防臺灣，形成對中共政權的軍事圍堵。(120)

冷戰的面向錯綜複雜，除了軍事，還包括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社會、教育等方面，「凡有利於敵消我長的策略都在考慮之列，其中重要的一環便是思想與文化的競爭，因此美方特別著力於把自身形塑為知識的前導，民主的先鋒，自由世界的領袖。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遂有文化外交之議以及具體的執行措施」(單德興 120)。正如貴志俊彥與土屋由香在《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這本重要的華文奠基性文集的〈序論：文化冷戰期美國的公關宣傳活動以及其對亞洲的影響〉所指出：

美蘇兩國為建立霸權、擄獲世人的「心」，不僅在政治、經濟、軍事領域，甚至在藝術、教育、娛樂以及生活型態上，也展開了文化、情報、媒體戰略工作。文化冷戰不光只是運用言語上的宣傳，也包含了秘密情報工作、文化交流、教育交流、科學技術合作、出版與翻譯、原子能發展、縮減軍備以及戰爭等，涵蓋了所有影響國際輿論的各個領域。(3-4)

進一步落實到美國與臺灣的教育與文化方面，趙綺娜在〈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〇)〉一文中，將目標在於爭取「外國民心」的美國公共外交 (public diplomacy) 分為兩類：一類為運用廣播、雜誌等快速媒體 (fast media) 的新聞外交 (information diplomacy)，另一類為運用書籍、文藝等慢速媒體 (slow media) 的文化外交 (81)。筆者既

已針對出版翻譯書籍此一慢速媒體的今日世界出版社進行研究，為求更周全了解美國在華文世界的公共外交，探討具現其新聞外交的《今日世界》此一快速媒體也就理所當然了。

二、宏觀篇：《今日世界》的緣起與特色

《今日世界》原名《今日美國》，一九四九年十月由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編印，免費發送，一九五二年三月改名。第一期《今日世界》的〈寫在前面〉對改名有如下說法：該刊原限於介紹美國，後也報導與分析世界其他地方，為期名實相副，且「迭接讀者來函，要求改名」¹，遂有改名之舉。初期每份售價港幣二角，臺幣一元，頗為價廉物美。改名與發售的目的不在求利，而是為了降低官方色彩，避免讀者抗拒心理，以利流通，發



《今日美國》第五十三期封面（李威儀提供）、《今日世界》第一期封面（依利莎白女皇）與首頁。

1 湯勉，〈寫在前面〉，《今日世界》1 (1952.3.15):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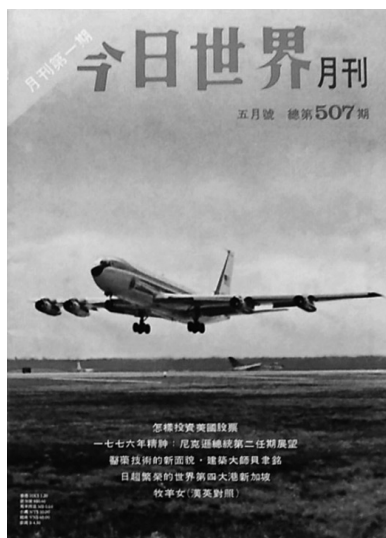
揮更大影響，但仍註明「美國新聞處編印」。一九五七年第一二五期改為「今日世界出版社編印」，以期讀者在不知不覺間接受其內容，卻仍不免「美國即世界」的意涵，內容泰半涉及美國也是不爭的事實。

為了達到普及的目標，《今日世界》的內容繁複多樣，力求多方位接近社會大眾，以期「寓教於樂」，達到兼具娛樂、宣傳與啟蒙的效應。² 相形之下，今日世界出版社則以知識傳播為主，所選擇翻譯、出版的作品既多元，又具有相當高的水準，在知識分子與莘莘學子中普受好評。兩社均為美新處所支持，各由文宣與文化的角度切入，目標分別設定為社會大眾以及學者、知青、學生，即使對象有別，但彼此呼應，相輔相成。

《今日世界》第一期於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出版，原先雙週發行，第五〇七期（1973年5月）起改為月刊，³ 至一九八〇

2 美方的文宣手法靈活多元，《今日世界》雖有不少圖像，依然以文字為主。為了達到更普及的效果，香港美新處曾於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六年發行新聞圖片雜誌《四海》畫報（*Four Seas Pictorial*），形式上仿照美國《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主要對象為東南亞華僑，由刊名便可以看出其既朝向海外、又面對中心之意。此畫報「被視為《今日世界》姊妹品」，以圖片為重心，中文閱讀門檻較低，目標在於意識形態與新聞傳播，「在『娛樂』中帶有『政治』，並具有大眾化和商業化的特質」（Wang 285）。

3 該刊自稱「擴充篇幅，革新內容」，篇幅增加一倍，較明顯的差異就是經常刊登書評與英漢對照的美國文學作品：前者評介的幾乎都是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譯書；後者轉載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短篇譯作，最引人矚目的就是第五四五期至五五〇期（1976年7月至1976年12月）以六期轉載夏濟安的名譯〈古屋雜憶〉（“The Old Manse”，Nathaniel Hawthorne原作，收入夏譯《名家散文選讀》第一卷）。這種策略既可增加內容，又可宣傳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成品，更可藉由英漢對照吸引有意學習英文與翻譯的人，一舉數得。



《今日世界》改版第一期與最後一期封面。

年十二月結束，共出版五百九十八期，主要流通於香港、臺灣與東南亞，以戒嚴體制下的臺灣受影響最大。第一期首頁開宗明義就是題為〈民主政治的發展〉的文章，前言強調「今天的民主政治，如不能克服障礙前進一步，就要倒退幾千年」，並將德國的納粹黨徒和全世界的共產黨員並提，以示其對人類文明的禍害。與之對比的是「人民自治」的民主政治，以及「平等、自由，和正義理想」，並表示「這些理想正如青草一樣」，引用中國古詩（白居易）「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固然適得其所，然而「青草」之喻置於該刊宣揚美國價值的脈絡下，很容易讓讀者聯想到十九世紀美國民主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草葉集》（*Leaves of Grass*）。

該文下方的〈寫在前面〉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黑暗與光

明，奴役與自由，獨裁與民主，侵略與和平」的二元對立論調，強調「在目前，正義正向暴力對抗，和平向侵略鬥爭，光明對黑暗照耀，自由對奴隸招手」，結尾則自我期許「在反奴役、反獨裁、反侵略的大業中」善盡使命，成為「支持『今日世界』的一個微小的力量和改善未來世界的一個幼年先鋒」（1）。全文雖未明言對手為共產主義，但由上方的〈民主政治的發展〉便昭然若揭，而且瀰漫著對抗意識、戰鬥氣氛與時代使命感。質言之，便是讓自由世界的華文讀者接受美國的價值觀與世界觀，確立反共意識形態，以達到文化外交的目標。

羅森棟在〈「今日世界」塑造映象的內容與範圍〉一文中，自第三〇五期至四二四期（1964.12.1-1969.11.30），隔期選樣分析了六十期的內容，依序列出1507篇報導文章的地域比例：美國（52.34%）、中華民國（19.78%）、中南半島（5.39%）、中共（4.13%）、港澳（3.5%）、星馬菲印（3.07%）……。⁴其中美國超過五成，中華民國（即自由中國）幾達兩成，合計超過七成，可見該刊報導的重心。文末綜合分析《今日世界》所塑造的美國形象：進步（24.7%）、發達（17.7%）、強大（11.5%）、平等（11.2%）、民主（10.8%）、安定（10.4%）、和平（8.1%）、繁榮（5.2%）。⁵

《今日世界》開數大，印刷精美，予人高端大氣的時尚感。首期封面為年輕的依利莎白女皇，⁶既符合世人對香港為英國殖

4 羅森棟，〈「今日世界」塑造映象的內容與範圍（上）〉，頁42。

5 羅森棟，〈「今日世界」塑造映象的內容與範圍（下）〉，頁41。

6 為方便讀者查考原始文獻，本書行文中的專有名詞皆根據原文與原譯，其中若干與臺灣的用語不同，謹此說明。

民地的印象，也開啟了以人物（尤其是名人、女性、政治人物）為主要封面設計的傳統。早期封面相當多元，如香港仔風光、臺灣高山族婦女、新疆舞蹈家、美國農村女郎、美國女大學生、北極的美軍雪橇隊、臺灣造船廠中的女工、臺灣蔗田女工、香港鋼鐵工人、香港女學生等。

整體而言，美國政治人物不時出現，主要是總統、總統候選人或當選人，如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史蒂文生（Adlai E. Stevenson）、甘迺迪（John F. Kennedy）、詹森（Lyndon B. Johnson）、尼克遜（Richard M. Nixon）、福特（Gerald R. Ford）、卡特（Jimmy Carter），而越戰時期訪問越南的國防部長麥納瑪拉（Robert S. McNamara）是唯一出現的部長。

科技是美國的強項，太空探險更是人類科技的前沿，因此太空人也出現於封面，如薛霸（Alan B. Shepard, Jr.）、卡賓德（Malcolm Scott Carpenter）、麥迪維（James A. McDivitt）與韋德（Edward H. White）、艾德靈（Buzz Aldrin）。中國政治人物則有孫中山（62期，1954.10.1，慶祝辛亥革命及中山先生誕辰），但不見反共盟邦元首蔣中正，可見該刊對孫、蔣兩人在廣大華文世界的形象自有評價。

後來為了吸引大眾，《今日世界》封面人物多改為明星，而且早於邵氏公司發行的《南國電影》（1957-1986），直到第五〇七期改為月刊後才較少採用。該刊在香港編印，當時香港電影業執華人世界之牛耳，因此封面人物以香港女星最多，如丁珮、尤敏、王萊、井莉、白光、何莉莉、李菁、李麗華、狄波拉、林翠、林黛、胡燕妮、凌波、張仲文、陳寶珠、葉楓、葛蘭、趙雅芝、鄭佩佩、樂蒂、蕭芳芳……都是華人世界熟悉的明星，其中



《今日世界》封面港臺女明星，左起為何莉莉、湯蘭花、陳莎莉。

李麗華、林黛更是封面常客。

臺灣的演藝人員出現得較晚，有上官靈鳳、白嘉莉、左艷容、李湘、沈香、翁倩玉、徐露、徐楓、唐寶雲、孫嘉林、夏台鳳、陳莎莉、張小燕、張正芬、張艾嘉、張美瑤、湯蘭花、紫蘭、甄珍、劉明、鄧麗君、龍君兒等。

好萊塢華裔女星也不時出現，如盧燕、關南施、諸慧荷、梅蒂仙等。尚有中國小姐、香港小姐、美國華埠小姐、夏威夷水仙花后、泰國華僑水仙花小姐、太平洋皇后等。華裔電視記者宗毓華則兩度出現於封面。這些在在為了顯示美國是自由開放的社會，華人只要努力就有出人頭地的機會。

郭良蕙是唯一選為封面人物的作家。足球球王李惠堂、十項運動健將楊傳廣是除了政治人物和太空人之外罕見的男性。這種男女懸殊的比例與性別再現相當程度反映了該刊的性別意識：男性表現於政治、科學、運動；女性表現於影視、選美。⁷

7 此說法主要針對封面設計予讀者的印象。林純秀「由性別的角度切

《今日世界》的封底則經常選登藝術作品，傳統與現代都有，以示傳承中華文化，又開放多元，契合現代。國畫如林玉山、姚夢谷、高逸鴻、張大千、黃君璧、趙少昂、歐豪年，水彩畫如張杰、藍蔭鼎，油畫如龐曾瀛，現代畫如席德進，抽象畫如李明明，雕塑如楊英風等。

有關美國的報導則以科學與政治最多，呈現了美國在賽先生（Science）與德先生（Democracy）兩方面的啟蒙者角色。有關中華民國的部分則包括短篇文藝小說與中國歷史故事，合計近五成，有意「以軟性，輕鬆的一面吸引中國的讀者，進而暴露在他們宣傳工具之下」。⁸不少知名臺港作家都是該刊作者，例如以歷史小說聞名的南宮搏就是常客，徐訐也發表過不少短、中、長篇文藝創作。林太乙的小說《丁香遍野》自第三二〇期連載至第三二九期（1965年7月至1966年1月）。當時從臺灣移居香港的余光中自第五四一期至五五八期（1976年3月至1977年8月）、第五六二期至五六三期（1977年12月至1978年1月），密集發表多篇散文和有關聞一多、朱自清與徐志摩的評論。⁹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張愛玲將英文反共小說《秧歌》自譯為中文，自第四十四期連載至第五十六期（1954年1月至1954年7月），並以《秧歌》封面作為第五十六期封底，配合文字說明

入」，發現該刊呈現的女性形象為「反共的『祖國的女兒』、『性感女星』、著重內涵的『現代主婦』，以及獨立自主的『時代女性』等多重形象」（82）。

8 羅森棟，〈「今日世界」塑造映象的內容與範圍（上）〉，頁43。

9 參閱本書第二章〈青青邊愁·鬱鬱文思：析論余光中的《今日世界》專欄散文〉。

「張愛玲女士精心傑作，現已印成單行本問世！請向就近書局購閱或在美國圖書館借閱」，列為「今日世界叢書之九」。¹⁰

由以上描述可明顯看出《今日世界》使出渾身解數，運用軟性的訴求、多元的呈現與迂迴的手法，以期普及於華文世界，尤其以發行地香港與「自由中國」臺灣的讀者為首要目標，力圖達到文化冷戰的目的。

三、微觀篇：以狂飆的一九六八年為例

前節從宏觀的角度指出《今日世界》的方針與特色，此節則以一九六八年為例，說明該刊如何呈現冷戰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年份。一九六〇年代風起雲湧，舉世有如進入狂飆的年代，而有「全球性六〇年代」（the Global Sixties）之稱，尤以一九六八年影響最為深遠，重要事件包括捷克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以及所導致的蘇聯入侵、越共的新春攻勢（Tet Offensive，又譯春節攻勢）、法國學生抗議之五月風暴（Mai 68）所引發的全球學生運動、美國政治人物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兩篇報導中譯為「金格」）與羅拔·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相繼於四月與六月遇刺、美國大選等世界大事。而《今日世界》的報導明顯反映了其一貫立場。

基本上，美國是民主、富強的「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與「機會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重視法治與人民權益（〈一九六八年美國民權法案〉〔390期，1968.6.16〕、

10 參閱本書第三章〈冷戰·離散·文人：《今日世界》中的張愛玲〉。

〈美國法律與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399期，1968.11.1〕），在文化方面益形豐富多元（〈日趨豐富的美國文化生活〉〔383期，1968.3.1〕），著重基礎建設與城市發展（〈美國全面開發各大河流的水利〉〔380期，1968.1.16〕、〈不斷改進的美國鐵路〉〔392期，1968.7.16〕、〈擴展迅速的美國小城市〉〔398期，1968.10.16〕、〈展望美國航空業的未來〉〔400期，1968.11.16〕），關心自己國家的貨幣政策與援外措施（〈維護美元的新措施〉〔384期，1968.3.16〕、〈促進自力更生——美國援外的主旨〉〔382期，1968.2.16〕）。¹¹ 其他一些報導則讓讀者更貼近美國社會的不同面向，並擴及影視界，如〈第二億名美國公民〉（382期，1968.2.16）、〈美國大學生是些什麼人？〉（387期，1968.5.1）、〈好萊塢的新派電影〉（388期，1968.5.16）、〈美國電視與黑人〉（402期，1968.12.16）。

一九六八年適逢美國總統、國會與州長選舉，正是推介美式民主的良機，因此自五月起就密集出現許多有關美國的政黨政治、選舉制度、選情分析以及當選人的報導：如〈美國總統的職權〉（387期，1968.5.1）、〈美國國會與今年的國會選舉〉（388期，1968.5.16）、〈美國總統選舉中的初選〉（389期，1968.6.1）、〈美國的政黨〉（390期，1968.6.16）、〈美國的州長選舉〉（391期，1968.7.1）、〈美國歷任總統〉（392期，1968.7.16）、〈美國總統選舉與目前競選形勢〉（393期，1968.8.1）、〈美國政黨怎樣推舉總統候選人〉（394期，

11 次年二月第一期（405期，1969.2.1）就有關於一九六八年美國經濟與援外的兩篇分析報導：〈一九六八年美國經濟展望〉與〈回顧一九六八年的美國對外援助〉。

1968.8.16）、〈轉變中的美國選民〉（395期，1968.9.1）、〈美國兩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397期，1968.10.1）、〈美國的民意測驗和政治〉（398期，1968.10.16）、〈美國大選瑣談〉（398期，1968.10.16）、〈美國第三黨與本屆大選〉（399期，1968.11.1）、〈代表人民心聲的美國大選〉（400期，1968.11.16）、〈美國當選總統尼克遜〉（401期，1968.12.1）、〈美國當選總統尼克遜圖片選輯〉（401期，1968.12.1）、〈美國當選副總統艾格紐小史〉（402期，1968.12.16）。這些報導不僅為讀者提供了該年度的選情與分析，更引介了美國的政黨政治與選舉制度。而民選市長不是高高在上，也絕非白人的專利，而是有著平易的一面，如〈華盛頓市長的一天〉（394期，1968.8.16）與〈美國大城市第一位民選黑人市長〉（396期，1968.9.16）便是這類報導。凡此種種都向華文世界呈現了美式民主的理念與實際運作，對於當時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以及戒嚴體制下的「自由中國」臺灣，都有相當的示範作用。

因為《今日世界》的對象為華文讀者，所以一向留意美國華人的成就、其與主流社會的文化交流，以及與港臺的互動。有關美國華人地位以及成功華人的文章，強化了華人作為「模範弱勢族裔」（Model Minority）的形象，以示美國平等對待不同族裔，提供各式各樣的機會，相關報導包括〈今日的美國華人〉（399期，1968.11.1）、〈教子有方的旅美華僑敖文宏〉（385期，1968.4.1）、〈三藩市新建的華人文化館〉（386期，1968.4.16）、〈公爾忘私的三藩市郵政局長李泮林〉（388期，1968.5.16）、〈重視環境因素的名建築師貝聿銘〉（395期，1968.9.1）、〈優秀的留美學生陳碧喬〉（397期，1968.10.1）、

〈才華橫溢的陳海蒂一家〉（398期，1968.10.16）、〈美國華裔議員鄧榮勳成功史〉（402期，1968.12.16）。文化、藝術交流的報導也不時出現，如〈美國研究中國文化的熱潮〉（389期，1968.6.1）、〈紐約舉行中國歷代園林畫展〉（395期，1968.9.1）。第四百期（1968.11.16）更出現三篇文教報導：〈趙元任博士談中國語文〉、〈李漢魂贈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的中國藝術珍藏〉。此外，該刊不時出現與港臺交流的文章，如〈香港學生領袖訪美觀感〉（384期，1968.3.16）、〈埃阿華大學的作家研習班〉（390期，1968.6.16）、〈陳文琬小姐談遊美觀感〉（395期，1968.9.1）、〈美國夏令音樂營中的香港青年〉（400期，1968.11.16）。

相反地，對於不利國家體面的報導則甚為少見，即使報導也僅是輕描淡寫，如震撼美國政壇、受到全球矚目的兩宗政治暗殺案，總計只有三篇報導：〈全美哀悼金格博士〉（387期，1968.5.1）、〈金格博士的未竟功業〉（389期，1968.6.1）、〈悼參議員羅拔·甘迺迪〉（391期，1968.7.1），便是具體例證。有關〈美國當前的三大難題〉（402期，1968.12.16）也只是聊備一格。至於受到全球學生運動衝擊下的美國大學校園，只有〈論美國大學紛擾不安及其對策〉（399期，1968.11.1）一篇，而美國國內盛行的反戰氣氛也罕見報導，與現實情況顯有出入。

相對之下，該刊對於以蘇聯與中共為代表的共產集團的批評則不遺餘力。有關蘇聯及共產思想的批評，如〈赫魯曉夫和「黨永無錯誤」的神話〉（379期，1968.1.1）、〈蘇聯集團對知識份子的新迫害〉（380期，1968.1.16）、〈情況仍甚嚴重的蘇聯住屋問題〉（382期，1968.2.16）、〈一九六八年

的蘇聯司法〉（385期，1968.4.1）、〈從馬克思主義到馬列主義〉（386期，1968.4.16）、〈錯誤百出的理論家馬克思〉（393期，1968.8.1）、〈蘇聯政制的基礎及其發展〉（394期，1968.8.16）。該年最後一期刊出〈斯大林之女史維蘭娜的一封信〉（402期，1968.12.16），更從個人的角度表達對於蘇聯政權的唾棄（燒掉其護照），以及在美國生活的自由自在（6-7）。¹² 有關捷克的政治變局與蘇聯的入侵，出現了數篇相關報導：〈諾伏尼垮台和捷克經濟〉（384期，1968.3.16）、〈共產主義在東歐變質〉（390期，1968.6.16）、〈捷克的民主實驗〉（391期，1968.7.1）、〈捷克自由化改革及其影響〉（392期，1968.7.16）、〈捷克危機的由來〉（397期，1968.10.1）、〈蘇聯僥倖造成的不良影響〉（398期，1968.10.16）。¹³

對於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大肆批評也在預料之中，如〈大陸農村的現狀〉（382期，1968.2.16）、〈從周恩來的講話看大陸現況〉（383期，1968.3.1）、〈毛澤東最近在湖南的講話〉（384期，1968.3.16）、〈大陸經濟主義的「歪風」〉（387期，1968.5.1）、〈泛濫大陸的無政府主義思潮〉（388期，1968.5.16）、〈中共的「革命委員會」是什麼組織？〉（389期，1968.6.1）、〈毛澤東的教育革命〉（400期，1968.11.16）。著墨最多的則是如火如荼進行中的文化大革命，數量幾可與美國選舉等量齊觀：〈「紅衛兵」的大字報與小字報〉（379期，1968.1.1）、〈「形左實右」的「五一六紅衛兵

12 繼以次年首期的〈一位蘇聯作家不願返國的原因〉（403期，1969.1.1）。

13 繼以次年首期的〈多災多難的捷克〉與〈誰是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者？〉（403期，1969.1.1）。

團」〉（385期，1968.4.1）、〈大陸最近的整肅運動〉（389期，1968.6.1）、〈大陸的新動亂〉（390期，1968.6.16）、〈「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陸青年〉（392期，1968.7.16）、〈廣州最近的紅衛兵武鬥〉（394期，1968.8.16）、〈「文化大革命」下的大陸電影界〉（395期，1968.9.1）、〈「文化大革命」下的大陸家庭關係〉（396期，1968.9.16）、〈「文化大革命」與中共的外交政策〉（397期，1968.10.1）、〈「紅衛兵的天下過去了！」〉（398期，1968.10.16）、〈大陸「一片紅」的後面〉（399期，1968.11.1）、〈北平正式罷免劉少奇一切職權〉（401期，1968.12.1）、〈中共的軍隊與「文化大革命」〉（402期，1968.12.16）。這些報導對於緊鄰大陸的香港，以及處於敵對狀態的臺灣，勢必產生相當程度的作用。

至於美國在中南半島介入甚深的越南，《今日世界》對於南越與北越的態度截然不同。有關南越的文章，主張〈南越人民的自決權利〉（386期，1968.4.16）、〈越南必須有光榮和平〉（387期，1968.5.1）、〈南越政府的合法地位〉（400期，1968.11.16）。相關報導多方呈現南越的銳意革新、欣欣向榮，予人情勢大好的印象，幾乎看不出南北越之間的激烈拉鋸：〈湄公河計劃：地區合作的榜樣〉（381期，1968.2.1）、〈成效卓著的南越昭安計劃〉（383期，1968.3.1）、〈南越教育事業的進展〉（388期，1968.5.16）、〈復興中的南越〉（389期，1968.6.1）、〈南越美荻市的重建〉（390期，1968.6.16）、〈忠勇為國服務的南越公務員〉（391期，1968.7.1）、〈南越安江省的農業發展奇蹟〉（392期，1968.7.16）、〈生活嚴謹的南越青年〉（394期，1968.8.16）、〈南越教育的新風貌〉（396期，

1968.9.16）、〈越南勞工同盟象徵著南越的前途〉（397期，1968.10.1）、〈越南婦女的新風貌〉（399期，1968.11.1）、〈南越漁民聯合會〉（401期，1968.12.1）。

相反地，北越的形象則不堪入目，既欺瞞，又無能（〈越共的自欺欺人伎倆〉〔381期，1968.2.1〕、〈小童巧奪越共武器〉〔384期，1968.3.16〕），出現各式各樣的外圍組織（〈形形色色的越共外圍組織〉〔394期，1968.8.16〕），對國內外進行武力侵犯（〈越共新春攻勢的評價〉〔385期，1968.4.1〕、〈北越對寮國的侵略〉〔393期，1968.8.1〕），而且軍隊內部也呈現不穩的狀態（〈北越軍隊日漸覺醒〉〔398期，1968.10.16〕）。

與南越一樣，臺灣、香港都得到高度正面的報導。由於《今日世界》以港臺讀者為主，相關報導不僅數量更多，而且涵蓋更廣。涉及「反共基地」臺灣之處更是多方正面呈現：在農業方面有〈臺灣農業堪稱亞洲各國典範〉（394期，1968.8.16）、〈從蘑菇看臺灣的經濟成就〉（400期，1968.11.16）；在教育方面有〈臺灣延長義務教育〉（393期，1968.8.1）、〈促進臺灣教育發展的動力〉（396期，1968.9.16）；民生建設方面有〈新近落成的臺灣新國民住宅〉（381期，1968.2.1）、〈曾文水庫：遠東最大的水利工程〉（384期，1968.3.16）；外銷方面有〈臺灣製傢具運銷美國〉（380期，1968.1.16）；宗教方面有〈臺灣東隆宮溫王爺〉（383期，1968.3.1）、〈反映宗教信仰自由的臺灣媽祖誕辰〉（彩色版）（392期，1968.7.16）；藝文方面有〈「白鷺人家」與余如季〉（382期，1968.2.16）、〈學而兼教的舞蹈家崔蓉蓉（彩色版）〉（398期，1968.6.1）、〈自由中國名女作家瓊瑤〉（391期，1968.7.1）；建教合作方面有〈大同公司

與大同工學院〉（389期，1968.6.1）；生態方面有〈臺灣的蝴蝶〉（彩色版）（395期，1968.9.1）、〈臺灣的熱帶魚〉（彩色版）（401期，1968.12.1）；人口政策方面有〈臺灣的家庭計劃〉（385期，1968.4.1）。最耀眼的報導之一就屬體育運動方面，如〈巨人棒球隊台中集訓記〉（387期，1968.5.1）、〈亞洲新鐵人吳阿民〉（388期，1968.5.16）、〈紅遍臺灣的紅葉少年棒球隊〉（397期，1968.10.1）、〈亞東女子籃球隊〉（399期，1968.11.1）、〈紀政獲低欄銅牌〉（401期，1968.12.1）。甚至還有青年休閒方面的報導，如〈自由中國青年的假期活動〉（彩色版）（382期，1968.2.16）。可說是極盡多元呈現之能事，以「自由中國」臺灣對比鐵幕後中共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藉此顯示反共、民主陣營的優越。

有關「東方之珠」香港的報導更是頻繁，無月無之，呈現的重點在經貿的繁榮與科技的先進，也不乏日常生活的報導，宛如華人世界現代化的表率：〈香港的電子教育〉（379期，1968.1.1）、〈香港工業展覽銀禧紀念〉（380期，1968.1.16）、〈香港美孚油庫開幕〉（382期，1968.2.16）、〈世界玩具展覽與香港玩具工業〉（383期，1968.3.1）、〈香港學生領袖訪美觀感〉（384期，1968.3.16）、〈現代化的香港漁業〉（385期，1968.4.1）、〈香港工業的發展〉（387期，1968.5.1）、〈香港工業的四大支柱〉（388期，1968.5.16）、〈香港青年工作者鄧美濤〉（390期，1968.6.16）、〈亞洲貿易中心：香港〉（392期，1968.7.16）、〈香港的假髮工業〉（393期，1968.8.1）、〈用電腦編纂的香港貿易寶鑑〉（393期，1968.8.1）、〈香港青年的夏令活動〉（394期，1968.8.16）、

〈香港新型兒童遊樂場〉（395期，1968.9.1）、〈品質優良的香港工業產品〉（396期，1968.9.16）、〈香港的原子筆工業〉（396期，1968.9.16）、〈現代化的香港海運中心〉（397期，1968.10.1）、〈暢銷世界各地的港製原子粒收音機〉（398期，1968.10.16）、〈復康工作在香港〉（399期，1968.11.1）、〈暢銷全球的香港傢具〉（401期，1968.12.1）、〈音樂之城：香港〉（402期，1968.12.16）……

至於美國其他亞洲盟邦的介紹雖然不多，但依然遵循相同的路線，以光明面為主，如〈東南亞最大海港新加坡〉（彩色版）（391期，1968.7.1）、〈馬來西亞華人科學家陳氏兄弟〉（401期，1968.12.1）。而有關韓國的報導則顯見冷戰對抗的態勢，如〈韓國經濟的卓越發展〉（381期，1968.2.1）、〈北韓嫉妒南韓經濟成就〉（385期，1968.4.1）、〈經濟建設有卓越進展的大韓民國〉（401期，1968.12.1）。

以上之所以不憚其煩條列諸多細節，旨在顯示《今日世界》的明確立場與慣用技巧——質言之，便是反共／共黨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以及黑白分明的呈現手法。凡屬我方陣營者，呈現的幾乎全是光明亮麗的一面，對於當時衝擊全球的學生運動，或震驚世界的美國政治人物暗殺事件，只見點綴性的報導，顯然避重就輕，以免有損於美國自詡的民主自由世界前鋒的形象。至於蘇聯為首的共產政權，尤其是中共與北越等附庸，顯得一無是處。儘管當時的敵我意識如此鮮明，然而該刊對南越的肯定以及對北越的貶抑，證諸後來越南政府的淪亡與美國的倉皇撤離，成為最大的諷刺。

四、事過境遷：《今日世界》的緣滅

在冷戰時期美蘇對峙的國際局勢下，只要有利於敵我勢力的消長，雙方都竭盡所能運用各種手段，其中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對策顯而易見，較不明顯的則是文化外交，雖然未必有其他方面那般立竿見影的效應，但迂迴的手法反而較不會引發抗拒，讓讀者於不知不覺中接受，達到普及的作用。不管就當時的現象或今日的回顧，美新處支持的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翻譯作品以及《今日世界》雜誌都令人印象深刻，津津樂道，見證了文學與文化這種軟實力穿越時空的特殊效力，以及不受限於特定的意識形態。

儘管《今日世界》在當時普及於華文世界，深入讀者的日常生活，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主客觀條件，變動不居，有生有滅。《今日世界》緣起於冷戰的需求，它的緣滅也與冷戰的發展有關。一九七〇年代美蘇關係益形密切，對峙態勢漸趨和緩，美國官方認為已無必要投注太多資源於對抗，在擲節開支的考量下，首當其衝的就是文化業務。《今日世界》由於銷量銳減，影響降低，雖曾在美國的文化冷戰中立下不可磨滅的汗馬功勞，卻難敵現實。一九八〇年十一月號（倒數第二期）的〈本刊啟事〉指出，該刊「銷量一九六五年達到了頂峰，曾有過一期銷數達十七萬五千份的紀錄」，然而「目前每期的銷數卻不足三萬五千份」，衰退的情況甚為明顯。十二月號的〈寫在最後一期「今日世界」〉提到第一期「改革未來世界的一個幼年先鋒」的自我期許，並認為「我們確已盡力達成這一使命」。在二十八年間「總共印行了七千八百八十五萬一千五百零一本」，若首尾相連，

「長度超過半個地球赤道——超過一萬二千哩。」這些數字的確令人咋舌。

如今回顧，《今日世界》由於設計大方、封面醒目、印刷精美、通路廣闊、售價低廉、內容多元、報導平易近人，在資訊閉塞的冷戰年代，提供了港臺與東南亞等地的海外華文讀者甚多有關於美國與中華民國、香港等地的訊息，讓他們在潛移默化之下接受美國的文學、文化、民主制度、社會價值與科技地位，形塑其自由世界領袖的形象，並以「自由中國」臺灣的繁榮進步，對比中共統治下中國大陸的貧窮落後，讓讀者知所取捨，一方面遂行了冷戰時期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政策與戰略目標，另一方面也為民主、科學落後的華文世界提供了典範，發揮了啟蒙的功效，至今依然令人記憶猶新、傳誦不已，足見其深入人心與高明之處。

引用資料

《今日世界》379-405 (1968.1.1-1969.2.1)。

林純秀。〈冷戰現代性的國族 / 性別政治：《今日世界》分析〉。碩士論文。臺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2008。

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翻譯與脈絡》。繁體字修訂版。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3。頁 117-57。

貴志俊彥、土屋由香。〈序論：文化冷戰期美國的公關宣傳活動以及其對亞洲的影響〉。林鴻亦譯。《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

戰》。貴志俊彥、土屋由香、林鴻亦編。臺北：稻鄉出版社，2012。頁 3-24。

湯勉。〈寫在前面〉。《今日世界》1 (1952.3.15): 1。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〇）〉。《歐美研究》31.1 (2001.3): 79-127。

羅森棟。〈「今日世界」塑造映象的內容與範圍（上）〉。《思與言》9.4 (1971.11): 41-47。

羅森棟。〈「今日世界」塑造映象的內容與範圍（下）〉。《思與言》9.5 (1972.1): 34-41。

Wang, Meihsiang (王梅香). "Images of a Free World Made in Hong Kong: The Case of the *Four Seas Pictorial* (1951-1956)."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64 (Jan. 2017): 255-85.

緒論

文化冷戰與冷戰文化

一、往事並不如煙，如何反思再現？

筆者屬於戰後的嬰兒潮（baby boomer）世代，人生前三十餘年成長於戒嚴體制下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冷戰的年代。各時代的人自有其時空環境與歷史條件，這些一方面形塑了個人的感受與理念，以及同代共有的感覺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¹ 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個人與同世代的觀念與視野，以致有許多在當時習以為常、甚至視為當然的事情，在時空環境與歷史條件改變之後，尤其是原先隱而未現、不為人知的因素逐漸冒現，而有了不同的認知與看法。就筆者個人的生命與閱讀經驗而言，冷戰時期香港的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下文簡稱「美新處」）旗下的文化與宣傳事業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之一。

這裡所說的文化與宣傳事業，最具體可見的就是香港美新處所成立的《今日世界》雜誌與今日世界出版社。猶記得一九六〇年代，筆者居住在群山環繞的南投縣中寮鄉，一九五九年八七水

1 此處係採用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見解，參閱“Structures of Feeling” in *Marxism and Literature*, 128-35, esp. 132。

災沖毀了該鄉通往南投鎮的鐵軌，以致對外的唯一聯絡通道就是單線道的公路（南投通往臺中的鐵軌也沖毀，至今同樣未曾修復）。然而年少的我就是臺灣唯一內陸縣偏鄉地區的國民學校中，接觸到了《今日世界》雜誌。對於當時經濟落後、物質條件匱乏的臺灣來說，該刊印刷精美，內容豐富，遠非其他的報刊雜誌所能望其項背。即使因為年月已久，記憶模糊，對於該刊的絕大部分內容已經不復記得，然而總體印象之深刻，卻是個人生命記憶中不容抹煞的事實。

大學就讀的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與臺灣其他大學的英文系或外文系類似，都是以英美文學為主。在臺灣大學外文系朱立民與顏元叔兩位教授的倡導之下，於一九六〇年代末、七〇年代初引進了當時在美國已稍微過時的新批評（New Criticism），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臺灣的英美文學課程、教材與教法，甚至影響到中文系／國文系的文學思維與解析。在以文本為主的新批評風潮下，閱讀文學成為首要目標，解析文本成為基本功。

在臺灣成長的莘莘學子，中學才開始學習英語，而且高中與大學聯考的英文科主要取向是文法，而不是閱讀能力，更不是文學賞析。對於進了大學才正式接觸到英美文學的臺灣學生而言，僅憑著大一、大二的幾門文學初階課程（如西洋文學概論、文學作品讀法），就要跳接到英國文學史（大二、大三必修）與美國文學史（大四必修），每學年以兩千頁左右的文學選集為教材（這是美國大學生的教材），實在是極大的挑戰。

英國文學源遠流長，中文譯本與輔助教材較多，美國文學由於歷史較短，中文資料相對較少。許多學生受限於語文能力與文學訓練，無法確切了解經典作品的文意，遑論體會遣詞用字之

美，文學技巧之妙。在知識條件如此匱乏的情況下，今日世界出版社發行的美國文學譯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甚至成為學子必備的讀物，不但有利於日常研讀與考試準備，培養出美國文學的相關知識，有些人甚至進而以文學為志趣，投入專業研究的領域，筆者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對於今日世界出版社譯作產生特殊感情也不足為奇，後來才發覺在我這代的知識人中，這種感受相當普遍。該出版社的譯作雖然以文學為大宗，但也遍及人文與社會科學諸多面向，許多人在不少領域的啟蒙書其實都源自此處。

記得我就讀碩士班時，美國研究（American Studies）在臺灣的氣勢相當蓬勃，一九七八年成立的中華民國美國研究學會為當時難得一見的跨學門學會，成立之時盛況空前。筆者於一九八三年任職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該所為中研院罕見的多學科研究所，至今也依然是院內唯一以研究異文化為目標的研究所。與不同學門的同事共聚一堂大大拓展了我的視野，除了繼續鑽研本行的文學，也從其他同事學到不同學門研究議題的方法與特色（包括當時的「中美關係」，即現在的「臺美關係」），尤其是與歷史學門趙綺娜博士的討論，讓我更注意到冷戰時期中美的教育與學術文化交流。而當代文學與文化的洗禮，尤其是後殖民論述與文化研究等新興領域的啟迪，也激發我反省以往的生命經驗與學思歷程，思索以往許多視為當然的事情，包括在個人成長過程中印象深刻、影響深遠的《今日世界》與今日世界出版社。

然而作為研究議題，那畢竟是我不熟悉的領域，而且牽涉甚廣，因此我一直期待有人，尤其是有地利之便的香港學者，能夠鑽研香港美新處在冷戰時期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它在美國文學與文化傳播方面所發揮的作用。然而多年下來，一直未見到符合

個人期盼的研究成果。久候未果之下，我只好勉為其難，強迫自己走入這個陌生領域，希望藉由相關研究開拓自己的學術領域，解釋自己生命中曾經遭遇的現象，多少為有同樣關懷的人發揮說明與解惑之效。於是我選擇從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發，集中於自己專長的文學領域，將其視為美新處贊助之下的一個建制（institution）。由於相關文獻甚少，二〇〇四年我特地前往香港，在鄭樹森教授大力協助下，得以當面或電話訪談相關學者、作家、專家，包括當時任職於《今日世界》與今日世界出版社的人士，得到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在撰寫〈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一文時，我自覺承受著相當大的風險，因為學術論述的慣例是「小題大作」，而這篇論文的對象卻是多年前出版了幾百種譯作的出版社，即使聚焦於文學翻譯，範圍仍相當廣泛，實屬於「大題小作」型的論文，卻又不得不做，才有可能從這個基礎上進行後續的研究。

該文從冷戰的歷史脈絡以及美國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與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出發，運用翻譯研究中「贊助」、「代理人」和「目標論」等觀念，指陳該文學系列的整體特色、譯者角色與翻譯策略（歸化，而非異化），以最不帶宣傳色彩的方式，發揮潛移默化的效應，不僅成為冷戰時代美國文化外交的具體成果，並且超越歷史與意識形態的限制，引發更為長遠的文學與文化功效。附錄的「今日世界譯叢：文學類」分為四項（文學史與文學評論，小說，詩與散文，戲劇），提供讀者參考。該文為少數早期從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的角度，切入冷戰時期華文世界的文化生產與具體成果，發表之後竟成為我所

有論文中最常被引用之作，而且不限於文學或翻譯研究的領域，晚近還被收入賴慈芸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主題論文集編纂計畫成果《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以示臺灣學者在特定領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²

若說「大小相因」，「無大不能成其小」，接續此一文化冷戰與翻譯研究的大架構之下的，則是我對張愛玲與余光中的研究。之所以選擇這兩位華文世界大師級人物，與其說是因為他們的創作，不如說是他們的翻譯、中英文背景、香港經驗，以及與美新處的關係。因此，接下來的相關研究可說是「大題」之後的「小作」，「廣播」之後的「深耕」，集中於特定人物的「譯者論」，與前文中的「贊助」、「代理人」和「目標論」息息相關。

〈含英吐華：譯者張愛玲——析論張愛玲的美國文學中譯〉一文是從翻譯的角度，探討中英文俱佳的張愛玲，在冷戰時期如何參與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美國文學譯叢，其譯作的演化、翻譯策略、偶爾的失誤，以及作為譯者、自譯者、中美文學與文化協調者的角色。附錄「張愛玲譯作一覽表」則是有關她的多種美國文類（詩、散文、小說、文學史與文學評論）的中譯以及英文原作、自譯與英譯之作。此文得以讓讀者知道張愛玲文學志業的另

2 〈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一文，先刊於《中外文學》36.4 (2007.12): 317-46；後收入筆者的《翻譯與脈絡》，繁體字修訂版（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3），頁117-57；晚近增訂版收入賴慈芸編，《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467-514。下文引用〈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之處皆出自《翻譯與脈絡》。

一個面向。³ 余光中自稱翻譯為其寫作的四大領域之一——其他三者為詩歌、散文、評論。〈在冷戰的年代：英華煥發的譯者余光中〉從翻譯的視角來研究余光中，集中於他在冷戰年代，更精確地說，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二年與香港和臺灣美新處合作的四本不同類型的譯作：英譯的 *New Chinese Poetry* (1960)、中文合譯的《美國詩選》(1961)、余光中原作與英文自譯的 *Acres of Barbed Wire* (1971)，以及中譯的《錄事巴托比》(1972)。⁴ 這兩篇文章都結合了文本與脈絡，針對以文學創作聞名的作家，發掘較為人忽略的翻譯面向，檢視他們在冷戰時期在美新處贊助下所進行的翻譯，以及個人如何出入於創作與翻譯之間，發揮主動性，而非只是接受委託的譯者而已。

由上述可知，有關今日世界出版社美國文學譯叢的論文針對此一特定機制進行深度研究，提供了較廣闊的基礎。而有關出入於中英文之間的張愛玲與余光中的論文，則是在這個框架下進行的個案研究，由大觀小，由小顯大，彼此為用，互補互證。接下來就該研究《今日世界》了。

《今日世界》創刊於一九五二年三月，結束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前後二十八年，總計五百九十八期，內容包羅萬象，雅俗共賞——一言以蔽之就是「雜」。若說有關今日世界出版社此單一出版社的研究已經相當複雜，那麼針對《今日世界》雜誌的研

3 〈含英吐華：譯者張愛玲〉，原收入筆者的《翻譯與脈絡》（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頁 145-94；後經修訂收入《翻譯與脈絡》，繁體字修訂版（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3），頁 159-204。

4 〈在冷戰的年代：英華煥發的譯者余光中〉，先刊於《中山人文學報》41 (2016.7): 1-34；後經修訂收入《翻譯家余光中》（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頁 56-98。

究更是複雜得多，令我躊躇不定，以致裹足不前將近十五年之久。然而隨著年事漸高，深知若不面對，恐怕時不我予，再也無法處理這個議題，於是鼓起勇氣，奮力而為，本書便是這方面嘗試的成果。在介紹全書內容之前，宜先對文化冷戰與冷戰文化有一基本認識。

二、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美蘇對峙的態勢已然成形，影響到美國的全球佈局以及爾後許多國際事務的處理（包括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與戰犯的究責）。二戰結束後，一種不見硝煙的「戰爭」悄然出現於美蘇之間。英國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倫敦《論壇報》（*Tribune*）的〈你與原子彈〉（“You and the Atom Bomb”）一文中，首創「冷戰」（cold war）一詞來形容這種新世界觀（9），以及有別於「熱戰」（hot war）的另類戰爭。

一九四七年七月，美國外交暨戰略家肯楠（George F. Kennan）在署名 X 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蘇俄行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一文中，指出蘇俄在東歐、中國、朝鮮、越南、非洲等地的擴張，主張「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於蘇聯的任何政策的主要因素顯然必須是長期、耐心但堅定並警覺地圍堵蘇俄的擴張傾向」（575），以各種可能的方式來削弱對方。此即主導後來數十年國際局勢的「圍堵政策」。

為了扼阻共產主義，二戰後躍居超強的美國，以自由世界領

袖自居，號召理念相同的國家建立聯盟，在歐美大陸邊緣構築防線，圍堵另一超強蘇聯及其共產主義盟邦的勢力發展，任何可能導致敵消我長的策略都在考慮之列。因此，除了政治、軍事、經濟等措施，文化外交也成為重要選項。這些文化外交活動由美國新聞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簡稱 USIA〕）主其事，運用底下的分支機構，包括各地的美國新聞處，展開對外宣傳與交流，目標在於散播美國意識形態、形塑美國文化霸權、執行教化任務（civilizing mission），以圍堵共產主義。

以往有關冷戰的研究多集中於美國與歐洲。較早的如惠特菲爾德（Stephen J. Whitfield）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作為歷史的文化冷戰〉（“The Cultural Cold War as History”），提醒任何對於這段時期好奇的讀者，「要以既全球（作為地緣政治競爭）又在地的眼光來考量冷戰。」而他所謂的「在地」便是美國：「一九五〇年代的反共恐懼如何影響美國社會？紅色恐怖（the Red Scare）對於一般美國生活產生什麼結果？」（389）。該文也指出，「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審查了如此眾多的藝術家與知識分子，以致其檔案已成為文化冷戰的關鍵參考文件」（385）。

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一九九九年的《文化冷戰：美國中央情報局與文藝世界》（*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為研究美國文化冷戰的代表作，探究美國如何投入大量資源，由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透過文化自由議會（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等機構，於西歐秘密進行文化宣傳，包括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藝術展覽、國際會議、音樂會、出版等，「以助一臂之力，讓西歐知識分子放棄對馬克斯主義與共產主義殘留的迷戀，

更接受『美國的方式』」（1）。

魯賓（Andrew N. Rubin）二〇一二年出版的《帝國權威的檔案：帝國、文化與冷戰》（*Archives of Authority: Empire,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則透過大量的檔案研究，發現中央情報局透過資助文化自由議會等機構，在世界各地串連刊物，譯介反共文學作品，使得一些作家與作品受到全球矚目，包括了歐威爾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而前者翻譯的語言之多，發行之廣，幾乎達到空前。⁵此研究結合了全球化、世界文學、文化冷戰，從中可看出這些文化冷戰政策如何形塑了冷戰文化。

為了調整文化冷戰研究中重歐輕亞的現象，亞洲學者如何既放眼全球，又根植在地，甚至串連亞際合作，就成為努力的目標。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日本學者貴志俊彥、土屋由香與臺灣學者林鴻亦合編的《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該書指出，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美國新聞總署發送的機密檔案「遠東的指令及其對象」中，列出了日本、韓國、臺灣、香港、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緬甸、越南、柬埔寨、寮國等十二個國家與地區（15-19）。其中對於華文世界的臺灣與香港，有如下目標：對於臺灣，「不僅針對臺灣進行宣傳或活動，並向亞洲各地的 USIS 提供針對海外華人的宣傳資料」（16）；對於香港，「主要的目

5 筆者在“The Reception of George Orwell in Taiwan”一文中指出，在資訊傳播不便的時代，歐威爾的中譯本幾乎立即就在臺灣出現，因此斷定與中華民國堅決反共的立場有關。若非魯賓的考掘，筆者無法得知背後大有文章。

的是向亞洲各地的 USIS 提供針對海外華人的宣傳資料，並向中國大陸實施廣播宣傳」（17）。⁶

為了遏止共產主義的擴展，向華文世界廣為發聲，美國政府選擇香港為據點。根據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頒布的「美國對香港政策」NSC5717號文件檔：「利用香港作為對大陸進行宣傳和滲透的據點的戰略設想，美國政府將利用其駐香港總領事館和美國新聞媒介駐港機構展開對中國的宣傳攻勢，以取得軍事封鎖和經濟遏制所難以起到的效果」（趙稀方 88）。香港被選中的主要原因在於：地理位置優越，為面對中國大陸的最前線，並方便連結臺灣與東南亞；政治地位中立，不明顯左傾或右傾；言論市場自由，左派與右派各行其道，彼此角力，遠非戒嚴下的臺灣或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所能及；各路人才眾多，因其特殊文化與政治位置吸引了許多人，包括南來文人；物質條件優越，在華人世界首屈一指。⁷ 鄭樹森並稱香港為當時「唯一的公共空間」與「文化人的避難所」（14-15）。總之，在冷戰時期美國的文化外交政策下，華人／華文世界以香港與臺北為重鎮，由於地緣、語言與文化之故，兩地的美新處關係密切，

6 有關文化冷戰的「文獻回顧與理論評述」，可參閱王梅香，〈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頁 9-21。《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第三部〈文化冷戰研究的參考指南〉提供相關的英文、日文、韓文與中文書目、內容提要與網站（255-71）。趙綺娜的〈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〇）〉透過歷史檔案資料，分析美國政府如何運用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於臺灣進行文化外交以及其影響。

7 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翻譯與脈絡》，繁體字修訂版，頁 121-22。

積極合作，所訴求的對象包括一千三百萬海外華人。⁸

為了推動文化外交，香港美新處的新聞組與文化組各司有所司，分進合擊。新聞組負責文宣等業務，包括出版《今日世界》；文化組負責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譯並出版圖書。筆者在〈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一文中指出，該社資源豐沛，待遇優厚，譯叢以高酬禮聘港台著名譯者、作家、學者，選書嚴謹，編輯審慎，譯文流暢，印刷精美，定價合理，通路順暢，藉由長時間、大規模、有系統地譯介美國文學、思潮與文化，對當時華文知識界與學子影響深遠，成功塑造美國作為民主自由世界領袖的形象，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視為文學輸出與文化外交的範例（119, 129, 139）。

此譯叢固然彰顯了美國的軟實力（soft power），但由於閱讀門檻較高，對象多為知識青年或社會菁英，與華文大眾難免會有距離，為了貼近庶民社會，勢必得另謀管道。臺灣的美新處也不例外，提供的服務包括廣播、資料中心、電影和電視、印刷與出

8 筆者在〈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也曾指出，美國新聞署之所以選定香港為其華文文化生產中心，有其國際關係、地緣政治、政府治理、言論尺度、社會因素、物質條件、知識環境等因素之多方考量（121-22）；也可參閱王梅香，〈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馬華文學場域〉，頁 8-9，以及 Shen Shuang（沈雙）之文〈感謝王智明提供後者資訊〉。有關海外華人的數字，係王梅香引自臺北美新處的資料。她先前發表的〈美援文藝體制下的《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也指出，在文化出版上，「香港美新處的期刊（比如說《今日世界》和《小說報》），從香港船運到台灣的台北美新處，然後再發送出去，主要是轉往東南亞。至於台北美新處生產和支持的雜誌，包括《學生英文雜誌》、《文學雜誌》等，其背後最主要的邏輯仍是自由中國在民主制度下成為美國在東亞的民主櫥窗（showcase），而這種進步，也表現在『文學』方面」（92）。感謝須文蔚提供此資訊。由此可見《今日世界》的傳播範圍以香港與臺灣為中心，並擴及東南亞與海外華人社群。

版，⁹ 務期將影響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在港臺兩地的美新處業務中，最普及的刊物非《今日世界》莫屬了。半個世紀前，連筆者在南投中寮偏僻鄉下都能讀到。無怪乎傅月庵譽之為當時「港台雜誌界的龍頭老大」（148），隱地也表示該刊為「人人都讀的雜誌，讀久了，腦子裡裝滿了美國」（53）。曾經任職香港美新處的董橋在近作《文林回想錄》中更明言，「美國新聞處出版的《今日世界》期刊和叢書無疑是美國文化思想的統戰媒體，臺灣香港之外還銷遍東南亞各地」（27）。¹⁰ 由此可見《今日世界》流行之廣、影響之深，以及背景之錯綜複雜。而香港美新處旗下的《今日世界》雜誌與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譯的叢書，在華文世界所形塑的冷戰文化中扮演了獨特的角色，並且與華文世界其他相關的文化冷戰研究連結，儼然成為跨學門的新興研究領域。¹¹

《今日世界》原名《今日美國》，於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易名，表面的理由是為了名實相副（「時局瞬息萬變，世界其他各地的實況，亦在報導與分析之例」）以及回應讀者要求（「順從讀者意旨」），¹² 其實應是為了降低宣傳色彩，讓讀者心理上較不設防，以達到潛移默化之效。該刊原為雙週刊，自第五〇七期（1973年5月）起改為月刊，後因冷戰局勢趨於和緩，復以

9 王梅香，〈參加錫與美新處在臺灣的文化冷戰（1958-1962）〉，頁115-26。

10 感謝陳俊啟提供資訊。

11 筆者在鄭樹森引介下，二〇〇四年十月於香港以電話訪問曾分別任職於今日世界社的張同與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李如桐，兩人都強調兩社的區別，因為外界經常混淆不清。然而開始時確實有些翻譯作品是在「今日世界社」名下出版，甚至同時列於兩者名下，後來才有所區分，因此造成這種混淆並非無因。

12 湯勉，〈寫在前面〉，《今日世界》1 (1952.3.15): 1。

銷售量大減，故在完成階段性任務之後，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停刊，總共出版五百九十八期。《今日世界》主要發行於香港、臺灣與東南亞地區，允為當時華文世界最暢銷且最具影響力的雜誌。¹³

《今日世界》的發行時間長達二十八年，內容頗為異質紛雜，不像今日世界出版社那般目標明確——其實該社出版的作品數以百計，已然相當多元——因此研究難度甚高，本書則是知難而「進」的產物。

三、本書概要

若說筆者先前的三篇論文——〈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含英吐華：譯者張愛玲〉、〈在冷戰的年代：英華煥發的譯者余光中〉——是從翻譯的角度切入冷戰時期的美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並且聚焦於兩位與美新處及今日世界出版社關係密切的作家／譯者，本書則是從翻譯、華文文學與美國文學的角度，探討冷戰時期華文世界流通最廣、影響至大的《今日世界》雜誌，在議題上有相當程度的拓展。

第一章〈美國即世界？：《今日世界》的緣起緣滅〉旨在說明自認為民主自由世界領袖的美國，在冷戰時期為了防堵共產主

13 根據一九八〇年十一月號（倒數第二期）的〈本刊啟事〉，其「銷量一九六五年達到了頂峰，曾有過一期銷數達十七萬五千份的紀錄」；十二月號的〈寫在最後一期「今日世界」〉指出，該刊在二十八個年頭裡「總共印行了七千八百八十五萬一千五百零一本……長度超過半個地球赤道——超過一萬二千哩。」二文分別刊登於《今日世界》597 (1980.11.1): 27 與《今日世界》598 (1980.12.1): 2。

義，進行文化外交，於香港發行《今日世界》雜誌的歷史背景與主客觀條件。全文先以宏觀的角度綜覽全刊，指出該雜誌的方針與特色，由原先的《今日美國》改名為《今日世界》以淡化宣傳色彩，然而堅決反共的立場與二元對立的主張令人印象深刻。該刊印刷精美，售價低廉，通路普及，題材豐富多元、活潑生動，報導內容主要集中於美國，形塑其為自由民主世界領袖的形象。為了吸引華文世界的讀者，尤其是香港與「自由中國」臺灣的讀者，相關的新聞及報導也不少，甚至多期以港臺兩地的女明星為封面。

為了補充宏觀角度之不足，全文繼之以微觀角度，選定狂飆的一九六八年，檢視《今日世界》如何再現這個舉世風起雲湧、動盪不安的年份。細究便會發現，雖然該年舉世動盪，美國內部也頗不平靜，然而該刊所呈現的美國，對內重視民主法治與人民權益，強調基礎建設，對外實行援外政策，尤其適逢包括總統大選在內的各級選舉，更趁勢介紹美國的政黨政治與選舉制度，不過對於國內的兩宗重大暗殺事件——黑人民權領袖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與白人政治明星羅拔·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先後遇刺——以及大學校園的學生運動，卻只是輕描淡寫帶過。反之，對於蘇聯及其附庸的中共、北越則是極力批評，至於其盟友臺灣、香港與南越的報導則頗為正面，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

然而，成也冷戰，敗也冷戰。《今日世界》緣起於冷戰時期美國圍堵政策下的文化外交策略，一旦美蘇不再針鋒相對，雙方情勢逐漸緩和，最早遭到裁撤的單位之一就是迂迴曲折、難見立竿見影之效的文宣機構。儘管如此，《今日世界》在當時提供了

華文讀者許多資訊與娛樂，令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至今依然為許多人津津樂道。

第二章〈青青邊愁·鬱鬱文思：析論余光中的《今日世界》專欄散文〉中討論的余光中，與香港和臺灣的美新處素有淵源。余光中為臺灣的英美文學學者，更是知名的詩人與散文家。一九七四年他應香港中文大學之邀到聯合書院中文系任教，至一九八五年返回臺灣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前後逾十年。以鄉愁詩作馳名的余光中初到香港時，左派人士極力拉攏，甚至希望他能回「祖國」參訪，然而他絲毫不為所動，左派因此惱羞成怒，大肆抨擊。另一方面，昔日已有翻譯因緣的美新處相關人士邀請他在《今日世界》開闢散文專欄，前後刊登二十四期。

雖然研究余光中的詩作與散文的學者眾多，也有不少人指出他在香港時期的文風與題材之轉變，然而從未由《今日世界》專欄的角度切入。後來這些專欄散文打散，分別收入《青青邊愁》與《分水嶺上》，除非重返《今日世界》按圖索驥，否則無法確知這些文章最初刊登的所在，以及彼此之間的前後順序。因此，本文「從特定的建制性與脈絡化的角度，探究這些作品及特色，以彰顯它們在余光中的散文創作與文學志業裡可能具有的意義與地位」（本書 54）。由於散文專欄的字數有限，該刊又以普及華文世界為目標，因此較不見其實驗性的散文。此外，原先在臺灣任教於外文系的余光中，如今轉而任教於中文系，由於學術建制的改變，授課內容隨之不同，遂引發他重新評估五四以來的散文作家，於《今日世界》分享他對這些名家作品的評價，甚至加以評點、批改。

文中列舉了這些專欄散文的特色與關懷：香港意識、臺灣情

懷、故國鄉愁、文化中國、反共立場、中西對比、中文西化、文學評論。筆者指出，余光中應邀成為《今日世界》的專欄作家，為廣大的華文世界讀者撰稿，「面對如此龐大而多樣的讀者群，這些專欄文章反映了作者的讀者設定與自我要求，亦即針對這個廣大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發抒在冷戰時期身處號稱自由世界領袖的美國與共產主義對抗最前線的香港，一位當代華文作家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顯現了其處境之複雜以及個人應對、協商之道」（本書 59）。文末並附錄這些專欄散文的標題與出處，後續收入的文集，以及文章版本的差異，方便將來研究者參考之用。

第三章〈冷戰·離散·文人：《今日世界》中的張愛玲〉討論的是二〇二〇年甫度百年誕辰的張愛玲。如果說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目標著眼於「譯者張愛玲」，那麼《今日世界》強調的主要是「作家張愛玲」，除了於一九五四年分十三期連載她的反共小說《秧歌》（第四十四至五十六期）之外，也刊登有關她的譯作和另一部反共小說《赤地之戀》的書評，甚至還有她在美國大學的活動報導。一般的張愛玲研究根據的是作品單行本，本文則另闢蹊徑，以歷史化的研究方式，將她置回冷戰時期的香港歷史背景與文化脈絡，尤其是當地美新處的文化生產機制，著重於《今日世界》所試圖呈現的張愛玲形象，以期「為目前蔚為顯學的張愛玲研究提供另類視角下的一塊拼圖」（本書 107）。

此文從張愛玲三訪香港的因緣切入，特別著重於第二次，也就是一九五二年七月至一九五五年五月。離散到香港的張愛玲為了謀生，應徵到香港美新處翻譯海明威《老人與海》的工作，開啟了與美新處的合作，並與宋淇、鄭文美夫婦結為終身至交。她

不僅接連中譯多部作品，並且重拾文學夢，包括先以英文創作《秧歌》，再自譯為中文，刊登於《今日世界》，以及先以中文創作《赤地之戀》，再自譯為英文，尋求於國外出版，進軍國際文壇。以往研究者極少檢視《今日世界》連載版的《秧歌》與後來在香港、臺灣出版的單行本之不同，以及這些不同可能具有的意義。因此，本文敘述《秧歌》的出版史及背後的故事，也比較了連載版與單行本若干不同之處，並比對英文版，說明中英版本的差異，以及兩個中文版本的差異。而連載版置於雜誌的脈絡中，根據今日の後見之明，以及小說的藝術標準，更可明顯看出該小說並不因為反共而損及藝術性，反而因為小說藝術突出而超越了一時一地的意識形態，贏得更長久的文學價值。

全文以「以文字創作為家的離散文人」一節作結，呈現在二十世紀國共內戰以及美蘇冷戰的亂世中，一位離散到香港的文人，憑藉著對於文學的堅持，持續不斷以中英文從事創作的「華麗與蒼涼」，並且「在寫作中找到歸屬，終能『此心安處是吾鄉』，進而在文學史上贏得一席之地」（本書 154）。文末兩篇附錄提供《秧歌》在《今日世界》連載十三期的出處、內容與備註，也條列出該刊中所有關於張愛玲的評論，方便讀者查考。

前兩章探討華文世界兩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與《今日世界》的關係，下一章〈冷戰·文學·傳播：《今日世界》與美國文學在華文世界的傳播〉則是討論以通俗化、普及化為目標的《今日世界》，如何以自身為平台，運用各種不同方式向華文世界傳播美國文學，並與以美國文學譯作為大宗的今日世界出版社彼此合作。檢索該刊有關美國文學的文章，發現在數百期中介紹的美國作家，出現的次數多寡依序為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海

明威、卡波特（Truman Capote）、馬克·吐溫（Mark Twain）、瑪拉末（Bernard Malamud）、歐康諾（Flannery O'Connor）、歐文（Washington Irving）、傑克·倫敦（Jack London）這八位小說家，其中霍桑、吐溫、歐文為經典作家，歐康諾是唯一的女性，海明威擁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瑪拉末為當時劉紹銘大力譯介的猶太裔美國作家，倫敦以冒險故事走紅，最晚近的卡波特則以「非虛構小說」（nonfiction novel）《冷血》（*In Cold Blood*）聞名。他們的共同點就是作品都由今日世界出版社譯介給中文世界。

此外，該刊撰稿者多為當時香港與臺灣的代表性作家與學者，從紛雜的資料中可以歸納出幾個類別。第一類為個人文章，以散文家吳魯芹與（吳之學生）學者、詩人葉維廉為代表。第二類為書籍評介，由個別作家以書評（謙稱為「讀後」）與介紹的方式出現，評介的書籍幾乎完全出自今日世界出版社，以散文家、翻譯家思果與學者劉紹銘最具代表性。第三類為譯作轉載，以漢譯或英漢對照方式呈現來自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翻譯作品，此策略可謂出版者、譯者、讀者的「三贏」局面，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則是與吳魯芹同為《文學雜誌》創辦人的夏濟安。

由於這些作家與譯者都是當時中文世界的名家，筆者在討論他們的文章與譯作時，特地帶入他們的創作脈絡、風格特色與文學地位，一方面凸顯《今日世界》在當時港臺文壇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以另類方式來呈現翻譯在當時華文文化多元系統（polysystem，又譯複系統）中的地位。此文也提供了有別於一般臺灣文學研究的取徑，選擇從另一個立足點來觀察當時臺灣文壇熟悉的作家、學者與批評家，當可更增加我們對於冷戰時代的

文化現象以及港臺文學交流的了解。

〈結論：從今日世界看《今日世界》〉一方面總結各章要旨，並強調從這份雜誌的角度切入，不僅提供了刊登時的書目與版本資料，並有其特定的文學與文化意義，可發前人未見之處。另一方面指出國際強權的對立史不絕書，只是隨著不同的時空環境而出現不同的對峙情境。當今美國與中國之間「鬥而不破」的對抗，被不少人形容為「新冷戰」或「冷戰 2.0」。世人若能對於二十世紀的冷戰，包括文化冷戰及其所產生的冷戰文化與後續效應，有更廣泛的了解，容或可資借鑑，協助釐清目前的處境，研擬出更妥善的對應方式，建立休戚與共的意識，面對氣候變遷、生態惡化與疫情傳播等全球共同威脅，營造更有利於全人類生存的友善環境與永續未來。

四、結語：既一時一地又跨越時空

《今日世界》年代久遠，內容龐雜，探討時容易失焦，本書選擇從文化冷戰與冷戰文化的角度切入，首先說明歷史背景與此刊物的緣起，藉以提供時空脈絡，接著落實於個案探討，既聚焦於個別人物，如曾在香港居留、與美新處關係密切、兼具作家與譯者身分的余光中與張愛玲，也探討該刊如何宣揚與傳播美國文學。簡言之，全書選擇從作者論以及文學宣傳的角度出發，鑽研這份冷戰時期在華文世界流通最廣、雅俗共賞的雜誌。

本研究發現，《今日世界》固然是美國文化外交政策下的產物，卻也為當時資訊傳播不便的時代提供了特定角度的世界觀，對於當時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落後於美國的華文世界——

尤其是戒嚴時期的臺灣——發揮了相當程度的啟蒙作用，也吸引了不少政治立場相近的作家、學者與知識分子與之合作。然而這些作家與學者並非完全服膺於這種結構性因素，也未必因此曲意逢迎，而是善用這個有力 / 有利的平台，發揮個人的專長與能動性。換言之，在冷戰時期反對共產主義擴張的共同目標下，一方提供了寬廣的平台，另一方貢獻自己的文學與文化才能，彼此互利共生。由余光中與張愛玲的實例可知，他們忠於自己的專業判斷與文學標準，不為特定時代狹隘的意識形態所限，以致他們在《今日世界》上發表的作品，不僅在當時具有時代性，在多年後的今天依然具有獨特的藝術性。

因此，本研究藉由《今日世界》這份冷戰時期流傳最廣的華文雜誌，既呈現冷戰時期的歷史脈絡與結構性因素，更以特定的作家與文本為例，說明在時代環境與個人才能相互作用下所產生的具體結果。這份發行二十八年的雜誌以及同一旗下的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譯作，至今依然為許多人所津津樂道，在在證明了文學與文化的軟實力，既能回應一時一地的情境，又蘊涵跨越時空的穿透力。

引用資料

- 《今日世界》。〈本刊啟事〉，597 (1980.11.1): 27。
- 《今日世界》。〈寫在最後一期「今日世界」〉，598 (1980.12.1): 2。
- 王梅香。〈美援文藝體制下的《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台灣文學學報》25 (2014.12): 69-100。
- 。〈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馬華文學場域：以譯書計畫《小說報》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2 (2016.3): 1-40。
- 。〈麥加錫與美新處在台灣的文化冷戰（1958-1962）〉。《媒介現代：冷戰中的台港文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游勝冠編。臺北：里仁書局，2016。頁 111-58。
- 。〈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博士論文。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15。
- 傅月庵。〈今日世界出版社〉。《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148-53。
- 單德興。〈在冷戰的年代：英華煥發的譯者余光中〉。《翻譯家余光中》。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頁 56-98。
- 。〈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翻譯與脈絡》。繁體字修訂版。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3。頁 117-57。
- 。〈含英吐華：譯者張愛玲——析論張愛玲的美國文學中譯〉。《翻譯與脈絡》。繁體字修訂版。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3。頁 159-204。

- 湯勉。〈寫在前面〉。《今日世界》1 (1952.3.15): 1。
- 湯志俊彥、土屋由香、林鴻亦編。《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
李啟彰等譯。臺北：稻鄉出版社，2012。
- 董橋。《文林回想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21。
- 趙稀方。〈五十年代的美元文化與香港小說〉。《二十一世紀》98 (2006.12): 87-96。
-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〇）〉。《歐美研究》31.1 (2001.3): 79-127。
- 鄭樹森。〈香港在海峽兩岸間的文化角色〉。《素葉文學》64 (1998.11): 14-21。
- 隱地。《回到六〇年代》。臺北：爾雅出版社，2017。
- Orwell, George. "You and the Atom Bomb." *Tribune*, 19 October 1945. Rpt. in *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Volume IV, In Front of Your Nose, 1945-1950*. Ed. Sonia Orwell and Ian Angus.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68. 6-10.
- Rubin, Andrew N. *Archives of Authority: Empire,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12.
- Saunders, Frances Stonor.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9.
- Shan, Te-hsing (單德興). "The Reception of George Orwell in Taiwan."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40.1 (2014): 97-125.
- Shen, Shuang (沈雙). "Empire of Information: The Asia Foundation's Network and Chinese-Language Cultural Production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Quarterly* 69.3 (2017): 589-610.

Whitfield, Stephen J. “The Cultural Cold War as History.” *The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69.3 (1993): 377-92.

Williams, Raymond.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P, 1977.

X (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25.4 (July 1947): 566-82.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